

虬松堂詩文書畫合集

王履模 等著

王福穰 主編



王履模 等著

虬松堂詩文書畫合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主编 王福穰
副主编 王福扬 王福葱

退齋先生雅啟

王履模
2004年甲子

虬松堂诗文书画合集

王履模等著 王福穰主编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7 3/4 插页：32

2004 年 3 月第一版 200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每册工本费 40.00 元

前 言

敬爱的父亲，虬松堂的创造者离开我们已经 34 周年了。慈爱的母亲则辞世更早，已整整 40 周年了。我们五兄弟中，大哥和三弟也已先后离开了人间。劫后余生的我们兄弟三人，也都已到达或接近耄耋之年。岁月如梭，春晖苦短，我们这两代人都遭遇到多次战乱和风波，但回忆到故乡湖州的家园和第二故乡上海的寓所，回忆那“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欢乐日子仍然无限留恋。我们编这本书的目的，可以说是对过去的回顾和眷恋，并把我们的经历和业绩提供给子孙们作借鉴。

父亲王履模为明儒王阳明后人。虽然我们的曾祖和祖父都在湖州经商，但父亲自幼读书，参加过科举考试，到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工作了数年，又回到故乡经营祖父遗留下来的纸店。因营业兴旺，不久就在湖州城东门内购建占地三亩、住屋百余间、广植花木的虬松堂住宅。我们兄弟五人，除大哥外都生长在其中。父亲中年虽以经商为主，但爱好饮酒赋诗，收藏字画，栽种花木，可以说是一位“隐于商”的“名士”式的文人。母亲胡怡若出身仕宦之家，自幼爱好读书，常在窗外窃听塾师为兄弟们讲课，因而对四书五经、古文唐诗都耳熟能详，不少篇章还能背诵。稍长，又在当时新开设的女校读书。他们二人的青年时代正好在清末民初，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想，拥护辛亥革命，提倡爱国民主、自强好学、勤俭持家和平等待人的优良作风。因而当抗战开始，日军占领家乡，知道父亲曾在日本留过学，想利用他时，他匆忙携家逃入上海租界，忍受物价狂涨所造成的生活困难，坚决不为日寇利用，直到建国后才应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我们兄弟五人在父母的教育下，都养成了作风正派、勤奋

好学的习惯。在学龄前，父母亲已开始教我们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词。上学以后，一般各项功课都能名列前茅，特别是中国语文往往成为全班魁首。参加工作后，终身奉公守法，忠于职守，大都能崭露头角，被称为本单位的“秀才”或“笔杆子”，有的甚至被誉为“智囊”。我们在一生中都遭到过不少磨难和干扰，饱经忧患，蹉跎岁月，但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不同的贡献。有的遭到较大的坎坷而壮志不屈；有的自幼就因病辍学，仍能奋发有为。这些都应归功于父母亲对我们的教养。我们五人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大家都爱好诗词、文章和书画。我和三、四弟三人都是以诗词为业余爱好，有过不少诗词创作。三弟不幸早逝。我和四弟现在都还隔着太平洋为弘扬传统诗词而奋斗。大哥和三弟都曾从名师学过国画。大哥在晚年退休以后仍以绘画自娱。三弟则对山水画有较深造诣，为父亲所绘《鸿迹追寻图》12幅尤为其代表作。五弟则擅长文墨，虽无诗、书、画的创作，但也颇能欣赏。这种对诗文书画的爱好，半由天赋，半由家庭的熏陶，因而所作既能继承传统，又能适应现代，这都是应感谢父母亲的教导的。

我们五兄弟都有两个儿子，女儿则多少不等，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或到达中年，内外子孙已达数十人，散居国内外。他们都学习或从事不同的专业，包括文理各科，不象我们兄弟五人那样局限于文科和财经专业。但我们的子侄辈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影响，不少人失去了接受完整的、正规的中学教育的机会：有的参了军，有的当工人，有的则下放北大荒或农村劳动，受到了一些艰苦锻炼。但他们大都能克服困难，刻苦自学，终于考上大学，在各自的专业中取得一定成就：有的在高科技研究中有较大成绩或当了基层领导；有的取得硕士学位或评上高级职称；有的则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后赴国外深造，在美国的两个名牌大学中取得博

士学位；还有在美国长期勤工俭学后，毕业大学，在企业中担任总工程师。至于孙辈中，也有人在幼年就崭露头角，在中学里就成了数学尖子，经保送入中国科技大学后再出国深造。也有在小学中就显露出艺术天才，在当地儿童画比赛中得奖。希望其他子孙辈都能向他们学习，力争上游，发扬王氏家风，不负长辈们的期望。

这本书原为整理保存父亲遗诗而编，拟名《虬松堂诗存》。后扩大内容，把我们后两辈的诗文书画都附入，改名为《虬松堂诗文书画合集》，但仍以父亲的《虬松堂诗存》为核心。全书内容，包括“图片”和“诗文”两大部分：

《合集》的第一部分“图片”，其中又分为“相片”和“书画”两类。“相片”中除父亲的画像外，最早的是1907年父母亲和姑母随侍祖母的相片，已近百年之久，弥可珍贵。还有一张父亲早年的相片以及祖母八秩寿辰时我们家族与两位从兄家族的大合家欢以及建国前我们家族的合家欢，距今都已六十年左右。此外，还有父母亲和我们及子侄辈在一起的老照片，主要在上海、北京两地所摄。最后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兄弟五家的小合家欢和其他彩照及黑白照片。

后一类是“书画”。其中最主要的是1962年父亲追忆平生，自写诗文、由三弟作图的《鸿迹追寻图咏》，包括父亲诗文手迹和三弟的国画各12幅。后面是从父亲的挚友名家对这本图册的题咏37幅中选出的代表作5幅。接着是父亲的书法手迹，包括三张诗稿和数封家书，从中可看到父亲小行楷之精妙，使我们感到望尘莫及。至于后附我在大学时的《登楼赋》作文稿，则因文后有著名国学大师王遽常先生之十二字评语，后复得90年代《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先生之谬奖，故影印于此。下面的图画，首先是大哥退休后所作几幅国画，宝刀不老，足见根柢深厚。我于1937年避难乡间时所作几幅风景写生画，用笔稚

嫩，且画在劣质纸上。但因能反映故乡风貌，且保存了60余年，殊为不易，故不怕貽笑大方，仍予编入。络英侄女所作工笔仕女三幅，自学达此水平，确属不易。含英侄女虽系专业画家，但作品不多。此书中所收工笔花卉三幅，均极工细美艳，值得欣赏。菊英侄女在美院时主攻版画，不幸英年早逝。其画保存下来的不多。现选入之版画二幅及素描一幅，恐不能代表其水平。华林侄女所作国画勇孙幼年时像，非专业而能达此水平亦属难能。延浩侄幼年临摹国画三幅，山水、仕女、走兽均有，可见其非凡之天才。惜在美国不能以国画谋生，因而未能进一步深造，殊为可惜。

《合集》的第二部分为诗文，最主要的是父亲的《虬松堂诗存》。父亲一生写诗约千余首。早岁的诗稿存放在湖州家中，抗战开始时早已全部散失。到上海后因环境不佳，甚少吟咏。1956年入文史馆后，因有馆友的切磋唱和，到“文革”前已积稿达700余首，但“文革”开始后又全部自行毁弃。最后在1967—69年又写了一些。1970年父亲去世后，大哥曾将找到的诗稿复写抄录了数份，约有百余首，其中一份目前尚存我处。另外，我1950年来京后，父亲给我的家书中，往往附来数首诗稿。这批家书和诗稿都曾一度遭劫，后幸得璧还。现在我将这两部分诗稿集中在一起，按年编次，但有少数未能确定年份，乃仿《李义山诗集》的体例，分为“编年诗”、“未编年诗”两部分，共约220余首，词则仅有3首；另有对联3副以及评书稿和弹词开篇各一篇。父亲晚年爱听评弹，闻曾为唱弹词者写过多篇开篇，装订成册，现已无影踪矣。仅存之一篇可谓吉光片羽了。最后，还附有短文一篇及家书12封。

后面是我们五兄弟的诗文。一是大哥福旦的《花园居遗诗》。他对诗词未作过深入研究，写得也不多，但从现在发现的两首题画诗来看，亦颇清新可诵，且基本上符合格律，殊为难

能可贵。闻大哥晚年曾编有英语教材一册，现在已找不到了。

二是我的《迎旭楼诗词文钞》。我自幼爱写诗词，作为业余爱好，60年来写作不辍。收入《迎旭楼诗词稿》者达2,200余首，加上该书出版后1996年来新作，共约3,000首。现从中选出210多首，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1）与父母亲共同生活或悼念追忆之诗词；（2）与诸兄弟及侄辈相晤或同游之诗词；（3）返故乡或忆故乡之诗词；（4）与诗词书画有关之诗词（包括与诗友之赠答）；（5）出国至美、日、印度等各国之诗词；（6）一些被认为是短篇佳作或与重大事件有关之诗词。后附少数对联及诗钟、聊备一格。故此诗词钞决非“佳作选”。为照顾各方面，数量不得不多一些。其后附两篇散文。一篇回忆了我一生的主要工作业绩；另一篇为对平生所见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两件文物的回忆。最后还附有范敬宜和躲斋（姜铭）二位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与我有关的两篇文章，供参考。

三是三弟福磐（贞珉）的《景华斋遗诗词》。他在1937年避难乡间时已写了一些诗，到沪三年后又和我共同回忆乡间生活写了不少诗，曾辑为《丁丑避难纪事诗》。三弟这部分诗共39首，现已全部收入“30年代”之作。另有三弟妇提供的遗作诗词稿一包，经审阅鉴别，大体按其创作年份编次（分“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三个时期），共得29首。三弟于1977年去世前数月曾偕同事作雁荡山之游，遗稿中有《雁游杂咏》一小册，共七绝23首，经鉴别大都非三弟之作，但无法分清。特选录其中7首，以留纪念。

四是四弟福扬的《潞琴轩诗词选》。四弟自幼即有诗才。1937年避难乡间时，年方11岁，已写了《红月》一诗，收入《丁丑避难纪事诗》，现已编入。在高中时，即与同学组织“颢社”研究诗词。惜当时之诗词均未存稿，现在仅能回忆出《咏菊》一诗。投身社会工作数十年中，吟咏不多，一些稿件在

“文革”中亦自行毁弃。故现存者仅 1993 年赴美后 10 年来所作，自选了 113 首，均为佳作。其中和杜甫《秋兴》韵之《北美山居感怀》8 首，既有杜老沉郁之气韵，亦体现了现代海外华人追忆平生、怀念祖国之情怀，允称杰作。另有诗钟 10 比，亦臻上乘。

五是五弟福葱的《增光书屋文钞》。抗战开始离家乡时，五弟年方 9 岁，故受故乡家庭之影响较少，未对诗词产生兴趣。他建国初期来京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数十年，长期从事规划研究工作，被部内誉为“智囊”，对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晚年被选派为华东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亦颇有建树。这本集子中收了他的两篇文章：一篇回顾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纺织工作，另一篇则回忆父亲。文字虽不多，但颇有价值。

这本书之所以称为《虬松堂诗文书画合集》，因其内容是以虬松堂创建者先父之诗词及书法遗作为主，附上我们兄弟五人及子侄辈的一些作品，其中既有诗（包括词及对联、诗钟等）文，又有书画。因两度遭劫，留存不多，但汇集了我们这几代人的心血。

明年（2004 年）是先父诞生 117 周年，先母诞生 120 周年，大哥诞生 95 周年，三弟诞生 80 周年。谨以此书献给他们在天之灵，作为对他们诚挚的怀念。同时，也作为我们送给虬松堂王氏家族的一件永恒的礼物，希望大家都珍视它，作为传家宝世代代传下去，并把王氏的优良家风永远继承下去。希望在已逝先辈们英灵的呵护下，虬松堂王氏的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人才辈出，继承先辈们爱国好学、奋发自强、勤俭持家、团结友爱的优良家风，不辜负先辈们赐予的天才和禀赋，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王福豫

2003 年 10 月于北京

王履模传

一、书香促壮游

先父王履模，原名履皋，字瑞声；后改履模，字健安（庵），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旧历正月初四日生于浙江湖州（当时为湖州府乌程县）。据族谱纪载，远祖为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守仁（阳明先生），他的后代有一支迁居湖州。先曾祖又帆公、先祖桐斋公都在湖州经商，主要经营一家作纸张批发业务的大成纸店。

父亲是祖父的次子，降生较晚，备受宠爱，自幼延请名师教读。1904年应乌程县科举试，得录取入库，为附贡生（秀才），在湖州府中学读书。父亲后来回忆说：“岁甲辰，余年十八，应童子试，试场在城内右文馆。场规严肃，刻烛成文，操笔风檐，短短数百字，幸获录取入库。”又说：“湖州府中学，设于爱山书院旧址…中有邻碧楼，朴雅明朗。余与同学百余人均下榻于此。每日上课毕，返楼温习，芸窗摇翠，书味醺醺。”可见父亲当时是非常用功的，精研经史及古文，尤喜爱古诗词，有较深造诣。

不久，与先母胡怡若结婚。母亲出身名门，是清代四川总督幕府胡珊麓之女，我国外交界老前辈胡维德（馨吾）之侄女。她在四川总督府里长大，经常跟着兄弟们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大都能背诵。返乡入新成立之女校后，又接受爱国民主、男女平等、女子参政等新思想，志趣高超，与父亲可说是珠联璧合。

光绪末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父亲决定离家远游北

京，考入当时新成立的法律学堂学法律，但没有毕业就离开了。父亲后来追忆道：“北京象房桥下，在清光宣时新建华屋，设法律学堂，余曾考入为学员，然未竟其业。”就在这时期，父亲接触了很多具有民主思想的青年人，阅读了大量鼓吹民主的报刊，如《民报》、《新民丛报》等，使他的思想从儒家经典和八股文中解放出来，大大开拓了眼界。

1913年（民国2年癸丑），父亲偕三舅父胡仁清（叔珊）及陈武箴二人东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因自费留学资金不足，未能读大学本科，在法律速成班毕业后就回国。为时虽短，但父亲后来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曾写道：“扶桑东渡…抵长崎登岸后，顿觉换一世界。……次日即乘火车直达东京……东京为彼邦国都，学府林立，交通四达，而民屋雅洁，花木扶疏，到处园林，无不入画。”记得我幼年时，父亲曾对我说过：“日本不但各方面先进，而且风景如画，希望你长大后有机会去看看。”我直到1981年才实现这个愿望，可惜那时父亲已去世11年了。

同年，二舅父胡仁源（次珊）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正好父亲从日本留学归来，被邀任北京大学监兼总会计，父亲就携眷北上任职。那时大哥福旦（字应明）已四岁，姊芊璞三岁，先后住在沙滩附近的钱粮胡同和西老胡同。当时，大学教职员的薪水较高，而物价则很低廉，一家四口生活相当宽裕。父亲的办公地点就在北大红楼，和北大当时的教职员们都很熟悉，其中最亲密的大概要算湖州同乡沈尹默先生了。父亲后来回忆这段生活道：“民初任北京大学学监之职，先后历四年余。斯时红楼初建，办公人员皆集中于此。公余之，常在校内图书馆阅览古籍，或与同事诸君互作东道……抵掌论学，促膝谈心……”对住所附近的景山也非常欣赏，晚年曾作《景山听鸦》一诗回忆道：

景山清影落庭中，寄寓京华傍故宫。

天际归鸦鸣不息，万松摇翠夕阳红。

沈尹默先生晚年也曾写诗回忆与父亲这段交往：

高柳参差云影低，红楼相望与云齐。

梦回四十年前事，剩欲从君觅旧题。

1917年，胡仁源离开北京大学，由蔡元培接任校长。先姊革瑛又不幸夭亡。父亲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决定携眷南归，结束了在北方的生活。

二、苕霅乐幽居

父亲携眷南归后，在上海住了大约二年多，于1920年返回故乡湖州定居。湖州为浙西名城，北濒太湖，苕霅二水流经其间，风景清幽，历史上人才辈出。初到湖州时，住在祖父遗下的馆驿河头老屋。那时大成纸店为父亲及两位堂兄等所共有，因为管理不严，连年亏损，堂兄等都愿意撤股退出。父亲同意他们退出后，纸店就为父亲所独有，积极整顿，严格管理，经营大有起色，连年获利颇丰。1921年就在东门学宫兜购入新宅地，占地约3亩，并在原有的房屋南面营建二层新厦及大厅等建筑，从此开始了长达17年在湖州的生活。从1921到1928年，福穰（字禄民）、福磐（字贞珉，以字行）、福扬（字翔鸣）、福葱（字阶莫）先后诞生于此。大哥到上海上大学后，这里留下我们四个小兄弟，祖母也常在此居住，家庭规模比以前大了。

1921年父亲被推选为县商会会董并兼代副会长，襄助会长陈其业（字勤士），主持商会工作。为湖州商业界作了一些事。1926年辞去商会职务后，已成为当地社会名流，交游广阔，经常在外酬酢，有时也在家宴客。但他的交游不仅限于上层，对纸店职工也很关心爱护。记在30年代初，纸店新来了一位年青店员，名叫高颂章，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父亲很器重他，但

不久竟因“共党”嫌疑而被捕。父亲不避危险，挺身托人将他保释出来，仍留店工作。抗战前一年，高又突然“失踪”，看来肯定是投身革命了。但解放后始终未得到他的消息，我们至今仍很怀念他。

父亲定居湖州后，决心把住宅布置成一个安乐窝。新居南部主要是一座轩敞的大厅，面积约100平米。因为厅前院内有一株树龄达500多年的罗汉松，枝干屈曲如虬，因而被命名为“虬松堂”。大厅中间四根柱子上有二副木质抱柱楹联。其中一付写道：

褒德集贤，明勋证理；

资忠履孝，蕴义怀仁。

另一付是： 水木清华，便有濠濮间想；

琴书闲静，自谓羲皇上人。

这两付楹联说明了主人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忠于儒家的传统道德；另一方面，充满了名士气息。大厅的西侧是一间西式小花厅，我们称它为“洋房”，陈设雅洁，是会客清谈的好去处。“洋房”南是一个小花园，除原有古柏一株外，陆续栽种了梅、桃、玉兰、月季、桂花、蜡梅等花木，还有一缸荷花。“洋房”北小院中有牡丹台，植牡丹二本。可谓四时之花不断。父亲还爱好名种盆栽花卉，除有名种兰花及杜鹃等百余盆外，还有向日本购买进口的盆景数十盆，如五针松、铁皮松、红叶枫、三角枫等，分散陈列在各大院内，使整个住宅成为一座大花园，花飘香麝，鸟啭笙簧，明月清风，人间天上。

父亲的另一个爱好就是收藏字画。根据他的财力，收藏的主要是明末以来的名家作品，如明代文征明，清初翁（方纲）、刘（石庵）、梁（同书）、王（文治）的法书；清初“四王”的山水、近代吴昌硕、任伯年、费晓楼、陆廉夫等的人物、仕女、花鸟画幅等，指不胜数。最得意的是精选的100把摺扇，特制10个红木匣什袭珍藏，并因此自号“百簋楼主人”。父亲由于雅

爱字画，看得多，鉴别真伪的能力较强，成为家乡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

父亲还爱好旅游。春天泛舟碧浪湖，夏天避暑金盖山。有时独自作环太湖（宜兴—无锡—苏州）之游；有时带领全家到杭州游览西湖。登山临水，饮酒赋诗，充满着闲情逸致。父亲晚年在《碧湖泛月》一诗中描写湖州城南碧浪湖的风景道：

窪尊亭畔草如茵，三五良朋放棹行。

皓月流银风举袂，晴波澄练桨声清。

父亲虽然寄兴丹青，怡情花木，徜徉于山水诗酒之间，但决没有忘记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虬松荫盖下的小书房中，教我读古文和唐诗的情景；突然变天时父亲亲自送衣服和雨伞到小学的情景。父亲还编了一张不同温度下的穿衣标准，让我们遵行。真是“嘘寒问暖超慈母，面命耳提胜老师。”在父母亲的严格教导和较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我们诸兄弟的功课都比较好，从小学到大学，无不名列前茅。解放后虽然都在“十年浩劫”中蹉跎了宝贵的年华，但多少还能为国家作一些贡献。这首先应归功于父母亲对我们的教养。

在湖州17年优裕生活中，美中不足的是三弟的病。三弟大约在五、六岁时麻疹病后得了严重的咳嗽咯血的后遗症，时发时愈，不能根治。发病时险象环生，阖家不安，父亲尤为焦急。三弟也因此失去了宝贵的上学年华。后来虽然自学成材，精研国画，带病工作。但成年后仍常常旧病复发，终不永年，这是我们家庭中最大的憾事。

三、烽火惊酣梦

父亲和我们一家在湖州17年的安定生活终于为抗日战争所打破。1937年春天，我在杭州参加了长达三个月的全省高中生军训。7月中旬回湖州时，卢沟桥战事已经爆发。但南方还平

安无事，父亲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在湖州的最后一个安稳愉快的暑假。每天一吃过晚饭，大家都到东边新开辟的后花园草坪上乘凉，清风徐来，明月斜照，一家人谈古说今，评诗论画，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8月中旬，上海爆发了战争，不久因租界落炸弹，很多上海人逃到湖州。看到湖州的暂时繁荣，还赞叹说：“湖州真是福地”。但到11月初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湖州就顿时紧张起来，人心惶惶，纷纷谈论到何处避难。终于在11月14日父亲率全家雇一小船避往城南数十里的荻港镇。离家之日，父亲和我们望着满院灿烂的鸡冠花，依依不舍。

此后3个月间，父亲率全家辗转避难于荻港、竹墩、菱湖三个村镇之间。11月22日在荻港看到日本飞机轰炸，湖州城沦陷。直到年底前，负责在湖州看家的纸店经理徐炳润来荻港报告情况，父亲才知他的6大箱字画已被盗劫一空，不胜惋惜。为保护住宅，除让徐经理家迁入看管外，并将余屋分租给10多家居住。从此，父亲失去他经营近20年的安乐窝，失去他最心爱的6大箱字画。但仍庆幸阖家人口平安，“留得青山在”，就有希望重振家业。

父亲在城南避难期间，虽然颠沛流离，飘泊不定，但仍然非常乐观，欣赏那过去很少领略的水乡风光，品尝着比城内更加鲜美的鱼虾。特别是对竹墩的景物尤为赞赏。数十年后回忆说：“其地远山描黛，近水拖蓝，人迹板桥，鸡声茅店。居之月余，俗虑都消。”

1938年3月14日，父亲率全家自菱湖乘货轮经数天的冒险旅行到达上海，与原在上海的祖母和大哥全家见面。当时虽遍地烽火，但上海因为系外国租界而形成特殊的繁荣之地。父亲考虑到上海比较安定，我们几兄弟也可安心上学，决定在上海长期住下去。从此告别湖州，开始他后半生定居上海的生活。

初到上海时，父亲租了新闻路康庆里的几间房子，把家安排好，我们几兄弟也在上海继续上学，生活就安定下来。当时，父亲仍然按照他过去的生活习惯，常与朋友们听书饮宴，带我们吃广东点心。另一方面，与一些书画商交朋友，陆续购买一些字画。几年后，虽然没有恢复过去的规模，但也较为可观。

按照当时父亲的财力，完全有能力在上海购置一栋住宅，以免长期付房租，当房客。开始两年，父亲确实也曾东奔西走，看了很多房子，但总觉得房价已比过去贵了很多，始终未买成。过了两年，房价又进一步上涨，才在靠近徐家汇处买了一小栋房子，但后来仍嫌其交通不便而卖掉。大约在1941年冬，又因故迁往沪西钜鹿路景华新村，从二房东手中转租了一个三层楼。此后房价越涨越高，父亲就再也没有能力买房子而一辈子当三房客了。这是父亲到上海后的第一大失误。

父亲原来在上海的银行里有不少存款，认为只要坐收利息便可衣食无忧。他没有认识到战争时期，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都是无止境的，以常规的办法来应付战时的环境。这样，他在银行里的存款便象冰块一样不断消融。到1944年我结婚时便不得不把湖州最大的一栋市房卖掉，部分作结婚费用，部分用作日常开支。到抗战胜利，在欢欣鼓舞之余，他已无力负担家庭生活，大哥也因多子女而自顾不暇。幸亏当时我们这几个小儿子都已先后走出学校，有了工作，共同把家庭生活的重担承担起来。这是父亲到上海后的第二大失误。

父亲在湖州的纸店本来规模不小。湖州沦陷时，店中货物损失了一半。父亲长住上海，委托店中经理代为经营。这位经理也不懂得在高度通货膨胀的环境里如何经营商业的办法，而仍按常规经营。其结果，每年的账面资产金额越来越大，但实际存货却越来越少，年底帐面虽有利润，不得不留店中作营业资金继续周转，父亲再也不能从店中提款供家用了。这是父亲

到上海后的第三大失误。

由于这三大失误，父亲便从抗战前的“殷实富商”沦为抗战后的“一介寒士”，不得不依靠我们兄弟数人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不久我们又陆续结婚，有了小家庭的负担，赡养父亲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父亲 1938 年到上海后直到 1949 年上海解放这 10 年里，因生活环境改变，经济情况又不断恶化，加上身体不好，很少写诗。有时有些应酬的唱和，也因怕用脑而让我代笔。现在能找到的只有 1948 年写的《旧事重温》七绝 4 首，其中之二是：

南山相对起高楼，月榭风廊处处幽。

白发萱堂犹健在，看花扶背足闲游。

鼎彝瓶钵任安排，书画禽鱼亦畅怀。

嘉客来时花月下，吟诗酌酒兴尤佳。

可惜这样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

四、史馆沐东风

1949 年上海解放时，父亲怀着期待的心情迎接解放。他希望如脱缰之马的物价能够平稳下来，使他非常拮据的生活能有所好转。当然，解放后不久物价确实稳下来了。但我和五弟都先后调往北京工作，工资比在沪时下降不少。大哥也离开了海关，生活不太稳定。湖州的纸店，解放前夕早已奄奄一息。到 1950 年下半年，只剩极少量销不了的存货和 2 台破旧的印刷机，流动资金毫无，于 1950 年 12 月经政府批准停业。因此，解放初的几年父亲的生活并无多大好转。到 1953 年后我们的工资逐步增加，能给他多寄一些钱，生活才略有改善。

父亲解放后生活上的重大转机是进入上海市文史馆。1956 年 9 月，经周善培、徐森玉、江庸等的推举，父亲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进入史馆后，第一，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生